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四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一三期 ——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7c)

【读书札记】	我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	徐海亮
【史海钩沉】	“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中）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读书札记】

我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

• 徐海亮 •

今年春，我先是得到唐少杰教授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1）；继而，得到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纪实——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回忆》（2）。它们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出版的由学者撰写的，一个大学文化革命回忆与研究专著。沈先生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四一四”派红卫兵总负责人，他提供了第一手感性的文革材料。我认为还是由他们清华的亲历者来评说这回忆为妥。唐少杰则不同，他是清华的现今人文教授，却不是清华文革一代的同龄人；他的研究，是后来者的反思，是开始超出文革一代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范畴之后，从新的文化政治环境、新的话语领域来的反思。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他的优势与无法避免的局限；后代人或隔代人修写前代史，有他的阅历不足和难得的较为客观的思维环境、学术环境。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复辟时代”的法国革命史学高潮，一批复辟时代的史学家（如参与文化也投身政治的梯叶里、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以及一些著名的英国史学家），从各个方面来描述、研究这场人类“头手倒立”的历史运动，对其有贬有褒；经过几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世界史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进步的法国历史学派，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本人，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我说这些，是唐少杰和许多人难以同意的，因为他多次讲过，法国革命是一场革命，但是中国的“文化革命”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场革命，两者不能相比较和联想。但我和我的一些经历中国文化革命的同龄人，依然从参与的直觉和理性的追求，把中国1960年代作为历

史过程发生的文化革命，看成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法国革命（1789—1877年全过程—特别是大革命的1789—1799十年正史）可做历史比较的一次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这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长河里，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作用，今后会越来越被世人所认识。作为严肃的历史学，人类深邃的历史哲学和历史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与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和价值判断就足以概括的。

一、《一叶知秋》的意义

唐教授的这一研究，成功地把握了清华文化革命中最根本的一些典型性问题。其关键就在于清华文革涉及到当时中共政权的最高层，触动到文革理论与实践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也深深触及到和决定着基层文化单位干部和群众的政治命运；清华文革本身就是文革一个非常的典范。尽管一些当事人或其他研究者，并不一定同意唐的全部观点和方法，甚至有人干脆批评他是资产阶级右派学者。

写群众的文革历史，这是本书选题最成功的地方。它从1968年“百日武斗”切入，较为成功地介绍了清华大学以造反学生为主体的3年（计25个月）文革运动，其中所及的运动“群众基础”，群众与领袖、干部的“互动”，群众组织的“建制”、“运作”，群众组织的“思想倾向”“思想分歧”“思想冲突”，无疑都是现今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缺乏和苍白之处。对于文革这样纯属中共中央发动起来的政治运动，其历史进程的主体，究竟单纯是一些被崇敬的或指责的英雄豪杰，还是亿万民众？尽管是中共文革领导核心的鼓动和控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造就了清华文革，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到，能动的学生群体对运动进展、徘徊、惨败起到的重要作用。清华学生对文革运动的走向产生积极的推导影响，也一度出现了一个“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的历史。脱离了对历史进程主体的研究，一个有亿万民众参与的历史运动，就无法在文化领域里说清楚，无法明白它在影响和改变几代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与理念的深刻作用，也永远无法给后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全书开始，就从1966年8、9月清华出现的三支大学红卫兵组织，指出相比之下，“应该说只有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抓住了清华当时文革的症结所在”（3）。而当运动出现重大分化，出现所谓“团派”和“四派”的分野之后，唐书也准确地点出：“团派思潮是文革造反派的思潮或者说是激进的、极端的造反派思潮，它体现的是文革初期造反派群众的正统思潮，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毛泽东认同的思潮”（4），即团派是文革运动的主流派别。而这是许多试图认识文革或从领袖与群众互动关系里看文革的人，没有认识或者不愿坦承面对的事实。至于“四派”，作者认为：“‘四一四思潮’独树一帜，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5）。

作为文革后或后文革时期的学者，唐在清华大学文革的个案研究中，得出异乎寻常的认识，即“亿万群众对毛泽东文革事业的能动作用”，而且准确地意识到文革运动里中共的“加尔文”教派群众运动的存在，而“毛泽东不同于马丁·路德的一点在于：毛泽东本人既是文革的‘上帝’，又是文革的‘改革家’……这也使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具有了神与世俗领袖、改革家集于一身的耀眼光彩”（6）。在文革的群众性运动受到普遍指责和嘲笑的今天，认识这点比概念化地比附历史上的“暴民”运动或白莲教义和团，要有意得多。今天我们如复辟时期的历史学者那样，众口一词地指责文革群众组织的“伪民主性”和“伪共和性”，但纵观大学红卫兵思想的全过程，特别是其思潮激荡在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就能联想起恩格斯所说：“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

全书最后，作者从“河归旧道”，指出尽管毛泽东指责“四一四思潮”，把它当成一股右的思潮，但毛和中央文革并未部署批判这一思潮；说明毛泽东在口头上和思想上反对“四一四思

潮”，但在行动中或实践中，他开始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发生转折”。“不仅如此，在文革结束之后，迄今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7）。对所有热中于研讨文革思想和文革（66—76年）结束后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来说，这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团派”与“四派”都以他们意欲向往的“九评”精神，奋力投入了思潮的决定性战斗，无疑的也是拥戴和怀疑、抵制文革理念的典型事件。对于研究文革的成败、是非，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

本书既是讲述清华两派的思想分歧冲突的，其首要意义和层面上的任务固然是分析比较两派的特征与分歧的实质意义。作者认为，“四派与团派都是造反派”，而“以团派为代表的激进的、极端的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坚力量。造反派的产生既得益于文革发动者兼领导者的意图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质和要求……没有造反派，也就难以有文革。若是没有造反派，文革很难成为全国规模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群众性运动很难成为触及到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及全民心灵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反过来，没有文革，也就没有造反派。正是由于文革，造反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和世界政治文化史极为罕见的现行社会体制内的‘反体制派’，成为被文革最高领袖一时许可甚至所鼓动的反现行社会权威的所谓‘群众反对派’”（8）。

作者从对清华派别、思潮问题的简单批判——特别是对于“团派”和蒯大富本人的政治指责，进入历史、客观的研究境地，得益于他自己的钻研和深入，恐怕也与某些“四派”人物理智的教诲有关。文章虽以武斗作为切入点，但是对于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严肃的学人对其思想分歧的研讨，自然要高于对武力冲突与细微末节的兴趣。作者从对文革的理解，对于清华文革前17年、清华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队伍的评估、文革的群众运动的评价诸方面，详尽地陈述了两派的思路与言论，而且把握基本到位。

该书基本尊重历史实际，无有偏颇，具有较为深刻的反思。理论性的思潮辩论，无疑是清华文革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一个贡献。诚然各派在论战中，一些表述和概括，是否全部符合事实，全如对立面攻击和指责的那样谬误，又有当别论。它毕竟通过唐的记录和研究，留给世人一个历史记载，也点明了清华文革的永恒话题。一些更深刻和宝贵的回忆实录与研究文论正思考讨论和撰写付梓。但唐文毕竟是第一篇。

干部问题——特别是中、基层干部问题，是清华两派思想冲突——也是文革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作者无疑从众多文字材料的探索和亲历者访谈，感触和理解到这点。该校的中、基层干部，在运动初期就与学校高层干部一起被打倒或靠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华的干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镇压，也与运动初期的造反派有所类似，有所感触与反对，他们急迫要求解放和投身群众运动。他们一方面也追求文革的时兴话语与概念，急于跟进文革的步伐，一方面也自觉地维护建国17年来清华政治、教育体制的威严和他们自身的文化尊严。作者尖锐地指出“团派”，没有在《红旗》杂志67年第5期发表调查员与评论员文章时把握时机，反而形成了“文革崛起的造反派与文革前的干部队伍的一场较量”；相对而言，“团派”与干部的互动不足，在“四派”那里，“才充分显示出文革初期干部与群众的互动中，干部的局部的主动性和有限的主导性”（9）。作者引用和根据了“团派”在1967年4月的统计资料，对两派干部的政治成分、倾向做出社会学的分析，结论是“团派失去了原清华80%左右的干部力量”。（10）这或许是当年清华人都不得不认同的团派失势的具体原因。干部问题是文革里运动演绎和起伏、成败的关键，而清华的干部积极参与文革运动，并且产生对自身乃至全国运动走向举足轻重影响，则是全国多数地方和单位尚不可比拟的。

二、《一叶知秋》的闪失

在出于政治需要的控诉型的文革“是非”回忆成为过去时，学者严肃的“追究”和反思——

一文革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动因考量，其真正历史经验教训之所在，才可能会成为思想阵地的强音。作者在“从清华大学的历史看‘文革’的历史源流”一节里，业已铺陈了一个理念，即“对于文革的历史原因，还应该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把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国为走入现代化的历史，同文革的历史原因联系起来加以探索和考察，进而揭示出文革自身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出文革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可缺的‘插曲’而显示出上述历史的曲折和艰辛”。〔11〕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来反思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无疑是较为深刻的。而且清华大学也无疑为“一二九”到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从建国初的文化建设到毛泽东掀起文革的武器打破中共辛辛苦苦“箍起来”的这个“桶”〔12〕，提供了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个政治文化和“纯”教育文化的成败典范。

在唐氏书里，在沈氏回忆录里，在我们熟知的一代清华佼佼人物与芸芸众生的口里和心底，我见到的是十分精彩的精英文革历史。这无可非议。清华人本来就是各个精英阶层子弟和预备精英的集合，按照蒋南翔校长的初衷，他们就是作为中共政治、科技精英来培育的。一群青年学生与中共文革高层精英的沟通互动，几乎文革的每个重大环节（点）都与清华相关联，似乎清华业已触动了文革的中枢与包举了文革的整个神经网络，清华“天派”实为“通天”派，他们的“井冈山”是众山之上的奥林匹亚神山。但这点仅仅涉及到文革所揭示出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表层，学校问题仅仅是社会的折射；清华文革也仅触及中国文化历史渊源的一隅。不论是何种青年学生运动，不论其文化与理论的震荡如何，也仅是中国文化思想历史里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道闪电或一颗流星。诚然，思想的闪电可能瞬间照亮黝黑的夜空，乃至引发沉寂山林之火，流星的陨击可能是导致一次天文地质史的革命。

我的意思是：前三年清华文革本身还几乎没有触及到中国更广泛和深层的社会冲突，尽管清华“井冈山”人忙忙碌碌地在全国串联发动，他们才开始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底层。他们还基本不明晓知识分子眼界以外的中国（在沈的回忆里，提供了中央文革要员与清华学生的沟通素材，这些要员说到底依然是一些左派知识精英）。这样讲似乎对当年“粪土万户侯”的“井冈山人”大不敬，但的确他们热中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和运作，对北京以外的文革运动所暴露的更广泛的实际问题，感触不够、理解不深，对共和国砥柱的军人和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想什么要什么，不甚了了。作为“四一四派”“理论家”的周泉纓，几乎也是“井冈山”上的一位“癡僧”，他在书写《我心中的文革》前夕，我们讨论对文革的认识，谈到他从部队农场（河北沙城）到地方——河北成安以后，才看到基层的社会，他怀疑是否“蒯派”对中国社会对中共的基本估计反而对了？有文作证〔13〕。周后来的表现和他的实际思想冲突以及他自己承认，他几乎比人所共知的蒯大富还要“蒯大富”！我是赞扬他的坦率和真情，他终于明白在清华的“精英文革”表现外，还有更广更深的中国文革，在理性和疯狂的追求之外，也有一个现实的中国。尽管他几乎是一个清华文革和“四一四思潮”的自恋癖。

作者在借鉴西方当代治学方法上下了许多功夫，而且为了研究清华文革，也涉猎了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历史和清华历史著述，采访了不少经历文革的清华人，作者自己开始进入了历史角色，也被两派人的文革激情所感染（公正地说，不少年逾花甲和年近花甲的清华人，心中运行的文革情结程序似未从生物的电脑里退出）。但是，在该书里，对于与清华文革研究密切相关的人物心理，深入和展开依然不足，或者由于篇幅，或者由于本书还不是写清华文革史——作者意欲在清华文革全史里充分阐述？或者，老一辈的清华人，自我反思不足，还涩于向新一代的作者袒露历史与心声？作者在诸如蒯大富、沈如槐、周泉纓、罗征启、陶德坚和其他本应栩栩如生的重点人物的交代和铺陈上，都还过于简练，他们的经历、倾向、内心冲突、话语，他们为什么成为他们？给读者的印象不深刻（反过来，沈如槐纪实性的回忆就更能让人感同身受，进入历史的环境——我也不是赞扬他派性依旧的战斗风格）。其实，他们的一部个人思想历史和人生道路，应该非常鲜明地铺垫了和定格了他们在“十年里”的必然位置，他们作为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以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方法剖析清华文革的重头个案。我相信作者早已想了这些

和许多，但客观效果似未达到。

另一个应当重点描述的人物周恩来，不知何因，作者着墨十分清淡？周恩来是继刘少奇之后，介入清华且分管清华运动的人物，1966、67年的周恩来与清华的互动就不说了，面对“百日武斗”这个中央头疼的难题，周是什么态度和办法？他心灵深处对文革理论的“书生气”大辩论有无什么触动？在7月28日敲响清华红卫兵运动殇钟的事件里，他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我们当然不需要介入“井冈山”人的派性猜度或幼稚比附，而应看到和启示人们意识到周在清华文革中的位置。与作者对毛泽东的清华情结浓墨泼洒相比而言，周恩来的思想形象与风貌过于苍白。的确，毛泽东在“7·28”接见时，见了蒯大富委屈大哭，也不禁掉下政治老人伤感的眼泪。他深情和重重地紧握蒯的手；接见结束以后，又回过身来：“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并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14）而周在当日的接见里，足以披露他心理的讲话极少；诚然，此时无声胜有声，但唐书里是该有声的。

此外，也有清华人谈到，作为红卫兵运动最精彩的前两年，倒不如工、军宣队进驻以后，也即迟群时期更为重要，后来的文革运动，才更多地体现了毛泽东本意的大学斗批改和由此触动、展开的深层冲突。也许，这是我们走出了文革是非之地的学校以后，未曾体验和认识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吧。为何毛与尼克松说“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我们研究者不解。有人说这就指的六厂二校。难怪1975年陈云劝邓小平不要动清华北大，说毛只有这几个地方了。实际上，在文革的研究里，“50天”（实际为100天）的历史，三年的历史，十年的历史，概念与实质是有区别的。较小时段的研讨，也应放在更久长和延伸的尺度下进行思量。望他在今后继续清华文革全史的研究中，关注这些说法。

具体到书本里，我也有一些想法。如158页后谈群众组织的界定和功能，以及171页之后所谈“文革”群众组织的取向的两大段，应该说是研究文革群众和社会走向的最重点问题，这也是宫廷政治文化研究所不能触及的深层问题，是文革学走出密谋政治与精英政治史学桎梏的希望所在。不过作者在段落结构上似乎刻意于时兴的概念和话语，与国际接轨的功能理论框架，“议”过于超越了“述”的分量，就缺乏坚实史据；“述”嫌不足，也难逃西方政治史学和精英史学巢臼。而这些，是从实际参与的“过来人”不甚习惯甚至不大同意的。同类的作品，如英国G·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以及国人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对群众思想、语言、行为和抽象的取向的描述，就更为成功一些。这些作者也都没有参与过当年的群情激荡，而是靠查档案资料和深入采访当事人。（15）

对学生群众代表的蒯氏，作者极为概括地分析和评议了其人，早已脱出脸谱化和单纯政治指控，但由于对于蒯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浮光掠影式的扫描，对这种文革大学红卫兵典型人物的概括依然是欠完满的。1966年夏，薄老一波同志，直言蒯氏就是反革命，名字就是反革命；1967年夏，文革的副统帅林彪也言简意赅地指出蒯氏反对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实际是反党”。何以这个注定的“反革命野心家”成为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被精心培养和真心支持？

唐教授在叙述领袖与学生互动里，忽略了一些毛泽东早就对红卫兵领袖的极为复杂与矛盾心理的披露。

就在1967年初，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贵宾卡博、巴卢库时，就说红卫兵：“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

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请注意，毛这里讲的就是“四一四”的话语。到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总体失望，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要想说的话，早在67年五一节就讲了。

毛泽东1967年9月在武汉又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看来，毛泽东在文革中依然和1957年一样，对青年知识分子用的是阳谋而非阴谋，非言之不预也。一些议者说毛泽东玩弄、利用了一代青年人，是否肤浅，是否妥当？我在当时读到、听到毛最新指示的传达，直觉里担心的是毛针对蒯氏（并非直指武汉的学生），而他客观上代表着一代大学生造反派。所以，该书对领袖与文革学生头头的复杂心态、文化互动和心理冲突，仍有深入的必要。

该书恰当的叙述和概括了清华学生两派对于中共建国17年来基本形势的估计，以及部分还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平心而论，当时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对这些问题，并未上升到如此的理性去探讨，而是力求理论化和过分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予对方无限上纲，或自己托高论理“排球”奋力扣杀对方的辩论（文革里就有时兴话语的“托”）。而这种奋力“托高”和无情“扣杀”，增加了辩论的火药味，也引起了民众的好奇，乃至中共中央文革高层领导的关注。清华的辩论也无不引起全国青年学生的兴趣与关心，绝大多数关心者把它放在文革的“文化学术”领域来小心翼翼地研讨，只有极少的人把两种文革的异端思想，诉诸文论。1967年北京的“新思潮”，以及湖南杨曦光和被扯在一起的所谓“省无联”，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将问题推向更高更明白和更实际化。本来“蒯派”和“四一四派”的分歧，没有这些文革小报文献说的那样泾渭分明，那样悬乎。派性辩论里的说理和说法，不一定全部是历史研究的样品。如果“蒯派”真如“四派”攻击的那样，他们不早就成为中共文革派也绝对不能容忍的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造反派”了？或者成为1960年代的“民运人士”了？（16）如果所谓“四派”的理论真如“蒯派”蓄意攻击，四派奋力捍卫的那样神圣，那不仅不需要搞这个该死的伤筋动骨的“文化大革命”，也更不需要搞也是引发社会与文化、共产党政治经济基础动荡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同为政治、文化精英的“四一四”同志，岂不变成故步自封的凡夫俗子了？实际是：两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争先恐后投身于邓氏开倡的改革开放，清华人毕竟是清华人。“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但在后文革时期，对其引发的社会严重动荡和失衡，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异，也产生了几乎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激荡在想问题的人们心中。当年的派性歧见，已变动组合，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位置寻求支点与取向。

在有关的事实里，作者提到清华“红教联”和他的头头陶德坚老师，在阐述时基本引用的文革派性辩论的资料（沈氏回忆也基本沿用的当时批判“红教工”与陶的资料），没有来得及梳理为何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共产党员，却始终成为一个清华园的另类（她在80年代被武汉的朱九思校长接纳）？我觉得，对于教职工群众组织“红教联”所谓的异端倾向，特别是说它对“团派”的思潮影响没有交代清楚，按“四派”宣传所言，似乎这个异端正是两派思想冲突里重大问题的由来和关键？对于文革红卫兵小报文章和材料，特别是宗派斗争的辩论，不可不信，

不可全信，信也要站在当年是非争论之外来信。就像不少“四派”断然否认其思潮得益于政治成熟的干部指点（而蒯氏本人甚至不久前仍指认关键干部修改润色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样，也有当年的“团派”今天断然否认所谓“红教联”的一些意念与具体提法驱动“团派”思潮。由于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捉“后台”的思路始终是文革群众运动与反群众运动的认识误区，也是一些悲剧的缘起。清华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与进取的运动，是子教三娘而非三娘教子的运动。且如蒯氏抱怨的那样，“四派”毕竟不敢公开攻击堂堂正正的毛和文革小组（尽管心里严重不满），只有拿“中央文革的私生子”（“四派”批判原话）老蒯来打；打“团派”革命小将也不如死打“团派”所属的“红教联”及其影响的老师（年长的教授多倾向于团派！）。话说回来，陶老师被严肃批判的话，似乎出自以前政治学习中的言谈，原话也不那样讲。这些问题，她在“新语丝”网站上贴出的回忆录，可能已经说明。后来罗征启坦承：当时“四一四”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的头上。问题的深层，也是同样被“团派”欲置之死地的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今天讲透的，他说陶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院系调整和毕业分配到清华的一批天津大学的同志，在1957年受到运动冲击，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陶受党纪处分，这些老师对学校原来的极左做法不满，文革里以另一种过激的形式表达出来。罗老师是一个被“团派”死打，而又与蒯氏长期沟通甚而握手言欢的人物，他不仅仅是研究清华“百日武斗”和两派分歧的重点，也是读解清华近50年历史及其政治文化的重头人物。其经历和思绪从一个大彻大悟的精英，全“纵向”与全“横向”地剖析了清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这些，都是作者在研究清华文革全史里需要展开的。1957年，是60年代大学生在当时未曾认识的一个黑洞，不论是“团派”还是“四派”，都在这把达摩克利斯的剑下徘徊。（可能有部分右派分子或党政右倾分子子弟有感而不敢真言）唐势必已经读过陶老师的回忆，不知为何没有采取更为历史和客观的叙述？是篇幅原因无法展开吗？而这恰恰是两派激烈争辩的17年问题啊。对清华文革历史悲喜剧人物的反复解读和剖析，才能明白在最文明的学府里，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也只有在清华文革全史中读出了人性的宽容、人性的理解，才懂得了人格的真谛和文革史研究的永恒。

对教师问题深层剖析不足，也同样反映在对于清华工人的派性由起与发展上，笔墨几乎未及，是否工人仅仅在武斗里起到重大的“物质”作用？诚然，1968年以前的清华文革几乎是大学生一枝独秀的文革，干部、教师、工人的参与仍是有限的。在我就读的大学里，学生们曾认真地争辩高等学校工人队伍的阶级属性（且为两派分歧争斗的焦点之一）；在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这些市民社会较为发育、工业与经济较为发达的特大城市（乃至中等城市长沙），学生们也更易于被市民社会和城市阶层分野的问题所吸引，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对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众组织和个人进行过分析。这些问题不知是清华没有，还是唐氏未及？

三、我看派性斗争

本书披露的文革学生组织宗派斗争，也还留给世人更多的联想。毛泽东那时讲过，“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两派学生都是最认真地把这个知识分子冀希尽善尽美的斗争去“阶级斗争”神圣化。毕竟，这些书生意气的争辩（包括知识“托”托起来的原则分歧），也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一切真诚探索社会变革的人群中，总是有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理念和主张，有激进或温和，有革命和改良，有虎气或猴气，一个群体是如此，一个个人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万物的多样性和内在矛盾冲突，才构成原本就是复杂的事物；思想长河就更是如此了。一个人的思想追索，社会群体的探索和追索，总是一浪追一浪，一波反思否定一波。正确与错误，接近客观真理与背离客观，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斗争而发展的。文革的派别差异和思潮差异，有如色谱那样相区别而又相互衔接。而且在清华，决非“四”河“团”界，鸿沟难逾，而是犬牙交错，你中有我，“四”中有“团”的。每个个体，也可能是在某历史阶段，或某个问题上，某

种策略的推崇上，激进与温和的程度多少问题。其实，在中国每个政治集团和群体内部，每个地方，每个文革组织内部，乃至每个自觉思考文革要义的个人内心，都有二元取向的冲突，不乏“一万年太久”希望激进变动，与传统、秩序、稳重、政策、温和的斟酌冲突。我所在的学校，也有尚未分裂和尚未武斗的“团”“四”派别，我们都极为认真地讨论清华两派那似乎彪炳显赫的雄文豪论，而我校的所谓“四派”学生头目，居然和清华的沈如槐同乡，经历、个性相仿。

“四派”在1967年夏秋文革重要选择和转折的关头，推出《四一四思潮必胜》，在文革的理论框架中，在共产党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怀疑与批评了文革及其造反派，严正批判了他认为的从文革小组到造反群众的极左倾向，应该说是很关键的一击，从本质上说它是批判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该文是文革异端思潮的重要文献。可是，同一篇文章，周泉纓又概括出左的认识。（17）你说周是“四派”吗？他明明在这篇批判“团派”的徽文里鼓吹当时造反派认识一致的东西。然而《必胜》毕竟是“四派”的经典作。周先生至今仍平心地认为“团派”比“四派”更贴近毛泽东思想。的确，“团派”当时尽管错误百出，但他们的辩论，客观上触及到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代表人民？

从文革以后清华两派头面人物的遭遇，可以看到当初的分派，既很有意义，但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浪潮里也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因为两者都是极端唯我独尊的文革派。他们均被作为“三种人”或与体制疏离者未进入体制内。诚然，一些人并不理解自己的遭遇，部分当年大学红卫兵，依然以为，按自己派别当时的政治水平和策略、方法，是可以完成文革初衷，可以令政治清明、民富国强的。为此也发生过真诚的辩论。我写的《浅谈1957和1966年的大学生》，就反映了我的思考和一些怀旧讨论结果（18）。看来毛泽东说现在让红卫兵上台，马上就会被别人赶下台，应该是说对了。1966年冬，我在高教部那大殿里观看部直属机关批斗蒋南翔，当时曾震惊地想也认真记下：“12.9”青年运动的领袖为何变成文革运动里的走资派？红卫兵如果上台成为“蒋”，30年后会不会又成为新的蒋南翔？这会成为必然吗？（我的父亲也参加了“12.9”，也被这个革命淘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教训是什么？）结果是：红卫兵仅仅红火了2年，还没有类同蒋的辉煌历程。当然，我当时并不同情蒋，仅仅是理解他为何如此又为何被斗，我也始终不认为蒋在清华的“17年”，都作对了。“团派”对蒋的教育激烈反弹和批判，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代青年学生对于教养自己的学校和体制的反抗，也都是客观历史事实。业已发生的一切势必有其发生的内在动因和合理性。蒋的复职、清华在1980年代后的新发展，并未解答和解决1966年发生的思想冲突问题。我与唐在书本外议论清华17年教育体制的问题，谈了我对17年文化不甚认同的认识；不过，他反论说按“团派”极端政治化的意愿，自己去否定17年确实存在的错误，也根本否定不了。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当年疑惑的为何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就有了旁观者的解读。

这是对大学红卫兵的反思，是对清华井冈山分裂的反思，也是对至今还以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法的回应。多年前，周泉纓与我就读学校的同学辩论，他似乎拙劣地比喻蒯氏是今日的方腊，沈如槐则为宋江；蒯认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沈只认定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比喻不是等于，而传统中国文化的积淀与活跃在一代人心中。周直言不讳地说，不管那派上台，都会对对方实行专政的，别以为你会去搞无产阶级民主。这倒是说对了。唐少杰先生也严正批评对了。当年造反派迅速接过保守派使用过的极左武器，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他们听过党史，也读过党史，他们据悉王明自诩“马列主义从昆仑山下来了”！（毛泽东当年也讲过“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嘲笑和藐视王明，批判那坐在山冈上滚木雷石往下砸。后来，他们也嘲笑和藐视刘少奇是“紫禁城走出的马列主义”。但他们毕竟没有真正研究过党史教训，他们自己成为了“井冈山下来的”“天兵天将”和“马列主义”，批判的武器居然变成武器的批判。

最后一个不足的是，在作者带总结性的第八章“歧路亡羊”里，第三段“历史的轮回：评价红卫兵问题”，我来看去，该段虽然在某些抽象意义上，与当时大学出现的动荡与运动、思潮关联，但实质上各种评价与概估，均来自于对当年“老三届”红卫兵（特别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知晓和判断。这样，与本书的主题与宗旨发生一定的偏移与错位。大、中学红卫兵运动有一定共性的东西，但有很不相同的东西。这也就是文革以后文学、历史大量涉及红卫兵，其实往往只触及中学生或者宣泄了“老三届”的心声。因为对于大学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官厅和民间，尚未公开于世。当局为了长治久安的需要，在“老五届”里选拔“第三梯队”，同时也筛选和清洗“三种人”；在中共的组织系统和纪委系统内部，业已政治化地研究了当年的大学红卫兵（且具体到人）。不过民间缺乏研究的条件，则是一些暗暗的回忆与追述，处在“人自为战”状态；绝大多数研讨文论和回忆录，均未问世，更未能进入文化和历史的主流领域。可以说，唐和沈的书，还仅仅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大学文革和中学文革运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个理由是大学生基本是成年人，其人生观与世界观正在建立完善中，他们正在经受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参加文革，内心已经有了1956年以来重大政治运动所涉及的政治文化冲击的深重痕迹，1950年代以来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斗争、普遍反映的社会问题，诱使和驱使他们走进文革。这个“前文革”的文化积淀十分重要，而当时的中学生毕竟太小，一般还得不到起码的有关感受与理解。现在的研究严重缺乏对前文革的探讨，对文革以前大学生的生活、思想、心路的披露（周国平的回忆和出现的争辩比较可贵，也仅是一隅）。唐书本身对此也涉及甚微。一个研究文革颇有成就的朋友，多次问我当年大学生的思想分野与变化，我一再举例谈到前文革的大学生活与思潮、思想派别，对他们文革的取向与行为十分重要。但他也始终没有明白。因为他自己没有60年代初的大学经历和思想过程。斯坦福的文革—社会学学者A·魏昂德本来关注原本的社会与政治位置对造反的影响，近来又转向认为工作组的镇压决定性地驱使学生革命造反。看来，没有到此“庐山”一行，光凭文字资料，在文革故纸堆里找感觉，甚至也获取言传身教，还是会存在一定思想障碍的。思想的阵痛，经验和教训，似乎还得自己亲自感受领会。同时，另些仅仅从别人文字里探索文革，从国际学术前沿找解答中国问题药方的硕博，甚至以为在自己思维领域里的对文革思辩历史，就已经是囊括四海，超越前人，是比先人更科学的历史哲学，是否也有失书生气？

所以，在一片“忏悔”呼声里，不要脱离了历史与既得的政治文化，去苛求20上下的青年学生，唐教授书里披露了学生政治思想正是我们的教育成果，他们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和20世纪的五四时代、“12·9”时代，56—57年、1980年代一样，仅仅是意欲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20上下的青年学生。如果他们真在“庐山”幽林深壑之中坚持其“山头”和“江湖”意气（如世人所见），人们当然就会寄希望于“庐山”之外，出于严肃目的的史论和品评。

在《一叶知秋》的后面，作者也留给读者一些印象，即他在对治史的方法进行探讨。我相信这是他在哈佛校园里那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的历史哲学问题。我想起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2002年年会上，不少专家与学者对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对引见和借鉴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化中的相形见绌表示不同意见。在历史科学和文化借鉴问题上，我倾向于多元和多边的接触、兼容。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革命这个世纪难题，任何寄寓一隅或盲人摸象，最终都会是事倍功半甚至背离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违背历史事实本身的。从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大革命本身和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到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影响的现代法国史学，都对我们真正认识清华的文革历史有重要启发。因为与其是坚持传统史学的以政治、军事和杰出人物为研究主体，不如借鉴社会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教育科学，以至经济学、地理学[19]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角度探讨清华的文革历史，乃至中国的文革历史。我这里不是如当年的我们一样，简单地比附法国大革命文化和史实，追求大革命的霞光，也不是偏爱法国文化。而是我认为历史的法国政治文化与中国更为沟通，历史的法国进程与中国更为相互理解。毛泽东支持蒯大富对于清华的“彻底砸烂”，本来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巴黎公社教训的

总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特别是法国史学方法，或许能有助于解读这庚款后发育起来的清华文革历史。

注释：

- (1)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 (2) 香港时代文艺公司，2004年
- (3) 原书，6页
- (4) 原书，230页
- (5) 相对于全国的十余种代表性群众思潮而言；原书234页
- (6) 原书，99页
- (7) 原书，243页；242—243页
- (8) 原书，169—170页
- (9) 原书，143页
- (10) 原书，147页
- (11) 原书，78页
- (12) 援引庐山御碑亭所记元季癡僧吃语的比喻；1968年“百日武斗”陷入僵持阶段时，笔者正在庐山仙人洞读这朱元璋的御碑记载。
- (13) “这种严酷的现实使我非常痛苦，我在成安的十多年中经常想，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共产党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份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共产党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共产党要不变是难上加难”。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 1998
- (14) 根据当事人韩爱晶回忆的有关文字。
- (15) 王认为他按美国博导要求写的功能结构严谨的论文原著（英文），并不理想，劝我还不如仅仅去读这摘出的一小部分（指在港出版的中文著述《理性与疯狂》），大概也是说这样更适宜于中国学术实情和雅俗共赏的中国国情。
- (16) 人们会马上说红卫兵的思想资源是什么，怎么能与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相提相比！但文革的造反难道真与后来的“思想解放”是楚汉鸿沟为界、水火不容吗？请看周泉缨现今对57、66、89年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我从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联想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三次关系到民族前途的重大政治斗争—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和‘六四’运动。如果我们撇开工农和民族资产阶级不谈，应该说这三次重大的斗争都是知识阶级内部在野派和在朝派的斗争”。《关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主脉络问题》2004，电邮
- (17) “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势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第三，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必胜》。而且有意思的是，1967年初夏，蒯在周恩来与张春桥的要求下，撤走了清华“井冈山”（团派）驻汉联络站，从而也失去在“武汉事件”里表现的机会，诱导了在7月25日后的反弹；但7月下旬，“井冈山”“四派”的联络站，却乘虚杀入武汉，鼓动对已经改组的军区的怀疑，而且令沈如槐一生后悔的是，他不但没有能阻止一拨新的极左风浪，自己也亲赴武汉联络站巡视。我提出这些历史，不是揭短，是说明在我眼里，那有什么这派那派，清华人就是清华人。周还竭力将清华的文革

分野模式，推广到全国，在全国划分和钦定“团派”和“四派”，可能有失荒谬，至少是他那种精英文革思想和清华中心论、“4 1 4”自恋的反映。要强调的是，“四派”领袖沈，在当时也反对全国串联点火和周泉缨硬要介入河南文革，并抽象出什么模式的。他口头上和他的回忆录对此就有所表白。

〔18〕 原文如下：“有一点是大学生没估计到的，刘少奇忿忿不平的问题接踵出现：先是工作组，后来是党委自己，后来由军队出面，后来是部分造反学生自己也参加的一部分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在运动中执行了压制一部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没有摆脱这一政治文化定式；甚至红卫兵自己，一旦掌权，也迫不急待的压制，镇压其他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学生，有的还没有掌权，就已经积极参与镇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运动。或许，大家都把政权当作了名副其实的镇压之权”。思想认识与派别的分歧，无法在一个非民主政治制度化的环境里，心平气和的展开与化解。“红卫兵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的左倾，起来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雄辩理由下进行的。本来十分理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观念，意外的却变得荒谬起来。使人想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评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恐怖成了荒谬’。只要是想问题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都已在现实生活和冥冥思考中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一次次询问一些当年比较自觉的红卫兵，想问题的红卫兵，如果让红卫兵上台将会如何？他们承认，他们‘将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因为大学生的主要愿望就是为共产党的更加革命化而奋斗。文革的一个悲剧也正在这里，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学生，都避免不了这一政治历史的向心力。”（该文已于2000年上网）

〔19〕 唐少杰教授在书后附了当年清华的平面地图，这也算是地理学的表现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不足的是，该影印图比例太大且地名序号标示不清晰，参考作用受到限制。如果唐是一个理工学者，他就更会明白“工程师的语言”比一切都简捷的要义；而从一个冲突的地理环境来展开“百日武斗”的话题，对非清华人或清华人，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到今天，清华人的语言里，还不时谈及那些记忆犹新的地名，他们的头面人物，还在议论当时吴忠和8341部队的临时指挥中心在（后来）西哈努克居住的小院，议论若工人宣传队从清华西门方向进入（而不是从“四派”占据的东门），历史将会如何演绎变化呢！

〔编者按：徐海亮先生此文的压缩版刊登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本刊现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

## 【史海钩沉】

### “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中）

• 徐海亮 •

#### 二、“7．20事件”成为文革进程的拐点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系统——1、党政干部体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发动、保护和指导的激进群众组织，3、军队体系；指出从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以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汉事件”、清洗“五一六”组织、杨成武被解职和遣散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夏天的“武汉事件”，上承所谓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间接连接、触发清洗“516反革命集团”、遣散红卫兵（和杨成为中央权力斗争的牺牲），成为转折中的关键。分析深邃地提出〔8〕：“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1967年成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

## 1、确实不是一个武汉的问题

从“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军队介入支左和普遍压制革命造反，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继续推进群众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泽东和造反群众看来，运动始终沿着上升的轨迹前进。春天到夏天，一个一个省区的问题得到解决，造反群众得到中央的公开支持，群众组织也在整理组合之中，与1966年相比较，所谓革命与保守的两大阵线，业已初见轮廓。青海、内蒙、四川的斗争，体现出军队介入后情况的复杂未卜——总体性对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但在中央的指导和压力下，运动仍前进了，军队在重新体现保护人民、摒弃镇压的革命宗旨。但是，诚如迈斯纳分析的，军队难以确定到底谁是真正的左派，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稳定局势，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军队既担负着援助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又担负着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任务，而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军队领导人通常宁愿选择后者。未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9〕

对激进的反权威和反秩序的造反进行镇压，实际上鼓舞和支撑、整合了逆反文革的传统势力。这个整合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潜行，进行中的运动终于遭到“7·20”的狙击。尽管周恩来在7月18日讲话里也提到还会有反复的，毛泽东和他空前绝后地共赴武汉，亲自坐镇解决运动问题，但毛泽东却没有料到体制性的反抗会如此地强大与顽固，特别，是以空前浩大的群体性反抗表达出来（尽管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也说：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军队、发动群众推进文革，却遭遇到军队与体制性的群体的狂热对抗。毛身临其境，不能不感触到抵制文革理论与路线的问题何在，甚至感悟群体性的军民“红色”暴力与国家机器被蜕换为镇压人民工具的可能。毛泽东很不情愿地撤离武汉，周恩来不得不化装进入与离开市区，部分军队及其主官竟然抗拒军队最高领导的指令，对于党和国家的创建者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冲击。特别是这种狙击来自一再宣传的：我们应该相信的群众和依靠的军队；被狙击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创建者与统帅，也正是几十年革命群众运动的运作高手。所以周恩来在7月22日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10〕尽管，他已经看到代替了瘫痪的党政体系，唯一可以与文革路线叫板的传统力量。

对毛泽东来说，扩大人民民主与改造国家机器的相互促进与对立统一关系，还有极艰险的漫漫历程，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共运始终没有解决的现代政治学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人们指责67年8月的狂热，批判文革运动中“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口号时，实际上却回避了毛泽东文革初衷的问题。他在1967年的热月之后，还给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11〕。他在遭到阻遏和挫折，文革发生转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

## 2、对文革的怀疑和抵制不容忽视

文革的领导核心和激进文人，对于基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军队和普通工农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计过高，以为用仰仗毛泽东的权威、文革的舆论攻势、激进的群众运动，就可以较快地使传统的革命基础群体觉悟起来，拥戴毛号召的实际运动。

大家研讨文革，往往以为运动仅仅是杰出领袖与风云人物号召鼓动的，低估了出自内心的支持与抵制的群众性自发力量的能动性。基层的造反群众与传统力量面对面，体会到要证明自己革命性并成为多数十分艰难；他们缺乏政治训练与经验，在传统力量前显得十分冲动与幼稚，

往往被更有行政或政客经验人要弄，跌入政治陷阱。他们不懂得周恩来一再告诫红卫兵：正确的政策是路线的保证，继续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时——激进反抗的简单手法，来对付已被他们用暴力简单地“打垮”了一次的偏保守的群众，并对抗在这些群众背后的军队干部（他们冷冷地观察和极度的反感的运动）。毛、周，乃至到武汉传达精神的谢、王，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和不同意见的群众，就是批评和引导的造反派。部队干部和保守群众的本能的反对、恐惧的心理就不用说了，前面引述的言论与心态，已体现出他们几乎把在中央面前“摊牌”，作为一次生死决战。

有意思的是，运动中人们一再喜欢引用一条语录，说什么几何定律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致人们的反对。（12）可能这老话的真实意义在于：“7·20事件”里，毛泽东和造反群众都清楚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创导者毛泽东，违背了旧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狭隘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体制性力量从心理到实际言行的狂暴反对的。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对象没有限，哪怕你是我们曾经拥戴的毛泽东！

“7·20”反抗，由于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反抗革命政党与人民政府权威的暴力行径，理所当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造反群众，反对和压制下去了（“百万雄师”一些逐步自觉与始终坚持的分子，后来明确认为“事件”是被已经公认为“坏人”的林彪、江青镇压下去了，是一种“路线趋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线的压制和武汉军区改组、“百万雄师”如鸟兽散，并不等同于声势远大于宫廷“二月抗争”（党内高层正常的思想斗争）对毛泽东的第一次打击，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全盘溃退。

### 3、群众运动的高潮就是顶峰

犹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气流强烈交锋、拉锯的天气乍寒乍暖一样，武汉造反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初次真正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激变与反复，体会到激情的欢愉和政变的恐怖，经历了挫折与转折。在中央强大舆论的支持下，武汉造反群众翻身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新华社连篇累牍的报道与社论，给武汉群众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荣誉桂冠；以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表态，新华社广播点了全国一系列大致与“三钢”“三新”类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国的“革与保”阵线顿时分明，中央也力图让湖北问题的解决影响周边地区，推进全国运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欢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按林彪秘书转引叶群的话说：“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13）。的确，武汉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上升趋势中的最高涨，成为鼓励群众造反的文革方针的顶峰。不少造反群众以为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解决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14）。但是，顶峰就是转折，就是群众性狂热推进的急度回落。“百万雄师”的暴力并没有能使事件本身变成转折——即路线的让步，但取得事件胜利的历史进程却悲剧性地促使了历史必然的转折。

毛泽东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前，虽然有他路线的底线——强调大联合必须以造反派为核心，但也一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不赞赏非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他对武汉的态度与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对长沙运动的关心与倾向作参考（15）。就在7月12日——临去武汉前夕的闲暇中，他与挚友周世钊畅谈了长沙文革；他与周世钊一样有自己的倾向性，但也坚持两派没有不革命的理由，没有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没有在“7·20”的反动里被泯灭，反而被毛坚持光大。因为，他看到了用简单的群众造反、压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决原有旧体制影响下的群体思想问题，“百万雄师”对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识到无法用战争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径，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别斗争。他在继而的大江南北视察里，一路上讲这个

道理，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但胜利进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践现代政治生活里革命与民主的这个辩证关系。一个倾向压制一个倾向，一个倾向掩盖和追赶另一个倾向，“7·20”后的武汉群众，没有能够作到毛泽东号召的政策与团结，对“百万雄师”广大群众的政策攻心；虽然造反头头们也发了声明，有所布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客观形势根本不容许去实现：在省市的层面上可以强调与宣示，但到了基层单位，情况十分具体和复杂。元月分“工人总部”对待溃散中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群众基础的前身）的粗暴压制行为在7、8月里加倍——或许是残酷的武斗后遗症使之更为加剧（16）；“革与保”的矛盾，在每个单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体干部问题或宏观局势歧见重新分化、挂钩，纷纷反戈一击的“百万雄师”基层组织与群众，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组织（在河南省叫做“跳过来”，武汉叫“站过来”）。半年多来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的无谓争执，也非得人为的随即发展与激化起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告诫的“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仅仅成为一个口头传的信条。尽管大家都承认以中央确定的革命造反组织为核心搞大联合，但由于当年一直批评的非马列主义的小生产意识，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文革里更以极端“革命”也极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现。毛泽东的号召没有实际的反响。

武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使周边激化的冲突，得到某种冷静的参照，实际上两种思潮、两大派群众的斗争更加激化。情绪紧张的权力集团和头脑发热的群众，都在寻求摆脱困境、勇争革命与支持革命的出路。四川与重庆在造反派内部的武力冲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升级到顶点，创下文革中火器冲突的典范。江西一个军分区司令甘冒当“小陈再道”的风险，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战军进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军械，又与造反派争夺枪支，大打出手（17）；在8月的高热中出台的中央处理问题的决定，包含了武装造反派的内容，已经不能遏止几月来的基本态势，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不少部队和领导坚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对“支左”或“武装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任何口号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枪或明抢暗赠。湖南在处理本省问题的文件出台前后，两派之间、造反派内部武斗继续加剧（18）；甚至还出现了以镇压造反派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县血腥镇压所谓“黑五类”子弟的大规模野蛮屠杀。河南的运动几月来得到中央明显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点拨，在武汉形势与江青赞扬“文攻武卫”口号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对保守势力的武力压制的唯一的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主动出击难道真是必要的吗？（19）安徽造反派的长期冲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抢枪割据一步，幸好12军及时控制局势，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大概当时是武汉周边最理想的一个地方。这些进展，当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运动必然（河南受武汉制约影响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汉事件所体现的极力抵制文革与强力推进文革两种势力——政治能量剧烈冲突的外在释放和一些荒诞的演绎（四川的事态很难说有什么路线斗争的原则）。武汉在7月没能做或做完的事，周边——甚至全国依然在更加强烈地进行。双方都到了更加自为的地步。

连武汉人向来看不起的温吞水的上海运动，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势下，出现攻打“上柴联司”以稳定上海局势的棍棒武斗，当事人徐景贤回忆：“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装十万工人’……”，结果是“‘每人发一条棍子’”！（20）

各派群众对形势的推动，调动了难以想象的能动性 with 奉献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热的八月，只是各种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与能动的合成。新华社以各地对武汉事件的表态为契机，点了系列革命群众组织的大名，一时激进的造反派皆大欢喜，似乎每个组织都面临“革”了或“保”了的鉴别。胜利的武汉群众，居然自发出动数万人次，向周边甚至新疆“武装支左”。的确，事件对于路线的划分（？）和对立的加剧，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没有点到名的组织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定性为保守派），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对军队或造反派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形成省际联合逆反态势。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涨”吗？显然不可能是。多数激奋的群众可能都理

解错了，各种特别激动与活跃的群众里，真正想问题而且会思考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 4、绕不过去也冲不过去的军队问题

武汉出现的事件，令人们立即联想到早在1964年的《九评》里，就表述了毛泽东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强调加强党和人民对部队的监督，清洗军队中的坏人和“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提倡“群众专政”的观念，第一次以公开文献出现。在文革当中，类似的理念以各种文件、社论、讲话形式表达出来。

武汉事件中部分军人和“武汉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泽东有关理念的感性认识，他也从江西和武汉军区支持传统的基干民兵，发生残酷的武斗，意识到武装革命群众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感到部队问题相当严重，一再提出“武装左派”；给江青的信谈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21）提出“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他以为“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22）；试图压制他心目中文革运动的右派甚嚣尘上的反攻。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1011、1027页）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23）。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利用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

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并不主张的。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似未希望与主导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对普遍的抢枪浪潮也是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24），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

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散会后人们回到钓鱼台，戚本禹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电文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25）甚至到巡视江南时，毛还多次轻松地积极面看夏秋的全面内战。

在文革的初年，从事革命造反的群众，实际上较难理解老军人心理，尽管大家学习了几年解放军也崇拜拥戴解放军。笔者通过连队生活，耳闻目睹，才开始明白军人这个群体与工人、学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们的相互情感，融灌着兄弟生死情怀，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战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讲经历过战争共趟过血海的生还者。造反民众用简单的“支左”或“支右”来观察和要求、追求军人，其实严重地忽视了军人的本质就是军人；多数军人已经很熟悉地方与社会——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用特有的视角来打量彼此，革命战争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山头——这中国革命特有的时空情愫，或许决定着他们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与行为。在地方党政领导通通靠边时，毛泽东试图依靠军队来维系党的组织功能和政府权力。但是，17年来，部队再也不能简单是战争年代的战斗队、工作队，他正逐渐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后的一个稳定秩序工具，尽管在1960年代，部队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也实在难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复杂功能。一方面要继续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一方面又不得不维系枪杆子打下的政权秩序、坚守专政工具的职能，并卷入政治纷争，两难的局面，终于演成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悖论，出现了历史的悲剧。

陈再道是可能被公开在群众里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杀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许世友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也试图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诸军区 and 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情并未弄清。但是，他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当然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群众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26），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的领导的怀疑与冲击——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痼疾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28）如何正确处理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毛泽东选择了极大的让步和迂回，显示了他深谙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伟大战略家胸怀。

但是由于运动触犯了军队“众怒”，文革的出轨已成事实，倾向性的回潮、反复，只是时间



的问题了。

国外学者迈斯纳公正指出：“极左的领导人便大张旗鼓地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过怀疑，造反的群众也对军队发动人身攻击，这样，军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那把党弄得四分五裂、使群众运动分裂为许许多多互相交战的派别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强加于军队之上，内战的幽灵不祥地越来越逼进了……为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激烈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情绪给 8 月的新的极左行为火上加油，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到 8 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28）

周恩来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也最早对 7、8 月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风潮产生强烈的忧虑。8 月中旬以来，他连续告诫群众：“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7.20 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到 8 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7.20 事件”——后续的负面问题和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公开表述。但是，在“武装左派”的问题上，他十分谨慎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没有轻易去怀疑（29）。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组长陈伯达也不至于发疯到同意乱抢枪。后来陈与他儿子回忆：“1967 年夏天，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我提出应当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却遭到江青的反对。她反过来提出要‘文攻武卫’。我的收缴武器的意见就落了空”。（30）

从更深层的更“历史”的意义上看，革命的军队在新政权成立和巩固之后，势必有一个向政治制度化、专业职业化的过渡，对于依靠枪杆子获得的中国革命政权，更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军队、将领与党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在文革以前一些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证军队继续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争取军队现代化、军事管理制度化、实际生活中军队国家化的进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争。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剧事件，文革中的军队集体和个人的悲剧，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冲突与化解，都是我们在探索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阵痛，是漫长的分娩。文革里，毛泽东看到军队不适应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了），特别是看到军队可能被社会波拿巴主义利用（或社会法西斯化）的苗头，他想起了大革命国共合作阶段的“武装工农”，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与探索。经历过北伐历史的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参与创建的工农军队的将领，成为新政体新制度下的“北伐军军官”，成为对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众推翻。群众中仅有极少的先觉人物，敏感地联想到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联想到大革命中北伐军反动军官背叛革命的教训，强烈地要求将人民解放军置于党和毛泽东的绝对领导下。

因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歌曲《我是一个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国家、社会与军队的一个和谐和状态。但由于文革爆发，在 1967 年的实际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们发现歌曲浪漫的表述“来自老百姓”、“爱国爱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象文艺来自生活要高于生活一样，军队来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武汉问题在军队问题上爆发，毛泽东、激进文人，

和他们支持鼓动的激进群众对军队的要求，与恪守传统秩序的军队的心理、思想发生冲突。问题似乎是最彻底地解决了（林与周都这样说过），却有完全相反的连锁反应，并造成严重后果。以上陈述说明“解决”仍煮的一锅政治夹生饭。1967年以后，涉及军队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少，毛泽东就再不叫群众介入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右倾抵制和左倾的盲动，交织在一起，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件后的左倾与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懵了，人们不敢说“武汉事件”里陈再道将军和部队一个不字。人们忘了军队悲剧性的错误，忘了去总结军队干预政治、带政代党的严重教训，不愿意承认部队违抗军纪党纪的教训，更不愿去思考历史与后继的社会波拿巴主义问题。（31）

##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

8月在军队问题上的极左，仅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一个关键契机。周恩来业已看到了“军心”何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是支持陈再道或者打倒陈都影响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众不顾周的劝阻，执意打倒陈毅；在极左情绪影响下港办给英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愤激群众火烧英代办处。周的秘书周家鼎回忆（32）说：“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此时此刻，周总理对这种目无中央，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再不采取坚决措施我们就要犯罪了’。一项经过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中央文革黑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亲历者周秘书的回忆是非常可信的，周恩来对于文革小组支持的所谓“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汉问题上的被动、失策，遭致大规模反弹，毛、周政治权威扫地，随之是宣传口径出格，对于全国性的极左反军，陈司令卤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33），周恩来心里早就十分压抑、愤懑；在北京，从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中央各部运动趋左，外事口在打倒陈毅和港澳问题上也卷入极左浪潮；周恩来冷冷地听说王力的“八七讲话”，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闻司宣布限制英国记者的行动自由，8月12日，中华全国记者协会抗议港英当局；8月19日，外交部港办上报给英国政府的限时照会，也即最后通牒。照会发出，外事、宣传舆论和民众团体，再也不可能下台阶缓和局势；尽管周恩来立即通知文革小组，要他们出面干预群众造次，陈伯达也出面劝说。但一切已经不可能扭转。48小时限期结束后，示威人群冲击办公室，火烧了英代办处。尽管当天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外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气得手直发抖，也坦承“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就是目无中央”，“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弄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同时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34）事情的急遽恶化，使他警觉看到王力矛头所向：他两次气愤地打断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讲话，“你们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不过，在宣布王力错误时，吴法宪批判王鼓动火烧英代办处，周还承担自己在批准照会问题上的责任，说与王力无关）。

外交部造反夺权，直接影响外贸部和对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运动走向。

国内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各地的动乱，不比中央政府权威失灵中枢瘫痪更为可怕。周恩来面临了比武汉事件远要严峻得多的挑战。

他清楚一些院校学生（“516兵团”）公开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陈毅，目标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后是文革小组。（35）如果说，在困难复杂和危机的武汉问

题中，周恩来保持着与毛泽东的高度统一，尽力与中央文革保持合作与支持的话，武汉事件以后的局势——特别是中央核心部门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保持这种貌似团结而被动的态势了。研究者认为（36）：“（他）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伙没顾及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使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周恩来完全明白，全国和外事口运动的极左狂热，恰是武汉事件后左倾抬头引发的，8月22日，他批评广州抢枪是没有敌情观念，忿忿强调“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9月17日，他在处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务时，又忿忿地批评外交部负责人：“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众继续围攻陈毅，压制周恩来。8月26日，就在毛泽东同意将文革小组的干将作为8月来一切被动与失策的“替罪羊”的当天，外事口造反派试图劫持批斗陈毅，将事态推向高潮。周恩来从该日中午面见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并派杨去见林彪通报，再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之后，在子夜时分还（和谢富治、王力一起）接见武汉在京群众，已经精疲力尽；北外两派争批陈毅又引发周对学生的接见，但学生不听劝告，继续无理纠缠已服药物的总理，接见到27日6点40分结束。工作人员将周搀出会议厅，其心绞痛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八面应对、焦头烂额，高速运转、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被击倒在地。这仅是一个标志——狂热的8月到了收场的时候；总理的病倒，也标志着文革的中枢心脏病急发。不过，周恩来在倒下之前，已经和毛泽东分别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风险，通过最高层的运作，也在抛出王力问题上得到毛、林的认同；他等待了政治时机的成熟，扭转了文革运动的航船，终于维护了他的政治信念与尊严。如果说毛泽东是文革的精神导师，被欢呼为舵手，周恩来在1967年才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37）。

毛泽东次年也说：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系统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38）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也谈到这个问题。毛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答：“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